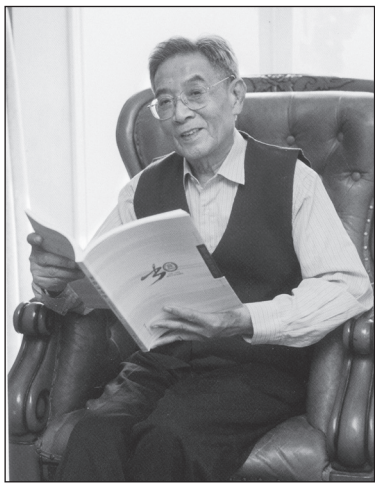




## 我的班集体

○ 罗福午（1952届土木）



罗福午学长

1947年7月，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二院毕业，毕业时虽然是全班第一名，但并没有给我过多的喜悦，因为我家境十分贫困。但母亲和我都认为“上大学是唯一的志愿”，母亲说：“我再苦也支持你上大学！”于是我报考了上海交大的电机系、杭州浙大的土木系、大同大学的化工系和清华大学的土木系；但我的志愿是做一土木工程师。果然清华录取了我，这使我万分喜悦，因为清华既有名望，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又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但清华远在北平，来回要支付旅费，生活要支付膳食费；这笔费用对我们母子来说仍然难以解决。怎么办呢？是叔莘奖

学金给了我这条通驶清华大学求学的人生大道！

我在高一时因家境清寒交不起学费，考取了由著名企业家顾乾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叔莘奖学金”，得以完成了高中学业。此时，叔莘奖学金为了支持考取清华、北大和燕大的得奖学生，决定为我们支付赴北平的旅费；又因清华不收学费，更承诺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的膳食费。这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恩情！

那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我和关侗、王盛沧、江幼钧等几个叔莘得奖同学一起乘“锡麟”号客轮先赴天津，再坐列车到北平前门车站，清华大学用校车接我们这批清华新生回校。途径西单大街、西直门，直奔清华的西校门、二校门，在大礼堂前停了下来。这时大礼堂里灯火辉煌，舞台上学生剧团正在演出。我们下车卸了行李直奔大礼堂，欣赏清华大学给我们的第一幕景色。我的第一印象是：“清华的文化生活多么丰富多彩！”

我第一次住进集体宿舍——善斋411室，“斋”就是书房、学舍。那时男生宿舍还有明斋、平斋和新斋，女生宿舍有静斋，以“斋”称宿舍，是要求学生把它们看成是读书学习的地方。那时没有班级组织，我们同室四人，两人为土木系新生，另两人分别为机械系和电机系新生。室内

## □ 我与清华

生活设备虽然比较简单，但窗外就是西大操场，视野开阔：“晨练晚训，球赛集会，尽收眼中”，我感到十分满足。

然而，1948年12月间，正值解放军即将包围平津时，母亲突然从上海发来三封急电：“母病速回”。我知道她害怕战争可能使北南分治，母子不能重聚，但十八年养育之恩使我难违母命，只能在清华办理了临时休学手续。可是回到上海后借读无门，不久平津和上海相继解放，我十分后悔脱离了大好形势，立即和十多位当时和我一起回上海的清华同学，在1949年7月1日乘津浦路恢复通车的第一列火车回到北京。在清华办好复学手续后，纳入土二班（土木系二年级）学习。这个班是有30多个同学的“和尚班”，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地下党员多，能歌善舞的多，彼此团结友爱。全班有一个共青团支部，班里的干部有总干事以及学习、生活、文娱和生产干事。开学后，我被大家选为学习干事，兼管班里的黑板报宣传工作；不久又被确定为“党的宣传员”（当时并未入党）。

刚解放，学习过程中政治活动多。

1949年冬，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校党委号召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我作为共青团员，自然不能例外，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报了名。不久，得知理工学院学生一个也没有批准，报名只是一种考验；我为此感受到一场爱国主义的教育。此后全校掀起制定爱国公约的高潮，我热情地参与讨论、制定，并用大红纸白字书写了九条爱国公约和全班同学的姓名，挂在土木系阅览室的墙上，作为全班同学学习时的信念和要求。

1950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高

潮，我们班集体到京郊门头沟煤矿做宣传，我和团支部书记赵思孔同学分配到矿卫队。他们要求我俩讲国际形势；恰好我们手头有一份吴冷西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我们就现学现卖起来，受到矿卫队工人师傅们的热烈欢迎。另外，我还用梯子爬在墙上写“工厂就是战场”六个大字作为“抗美援朝”的主要宣传口号；每个字3m×4m大，高度在地平面5m以上，几公里以外都能见到。工人们说：“这六个字给了我们为抗美援朝战斗的力量！”

1951年冬，我们班结构组和清华建筑系以及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的一批同学被调到鞍山钢铁公司，对原有的钢结构厂房进行实测，以便今后恢复生产。我参加了这次实测任务。东北的冬季比北京冷多了，白天一般在零下15℃左右。每天要爬到钢桁架和钢柱上去量构件的断面尺寸，数铆钉的数量。这时不但手脚都冻得麻木，若用嘴和牙齿去拉钢尺时，还会把嘴唇拉去一层皮。我们几乎每天要经受这种磨炼，但全队热情高涨，大家同一条心：“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三年级时要做“大地测量实习”和“水文测量实习”了。时间在暑假里，前者要求测绘圆明园中长春园的地形，后者要求测绘颐和园昆明湖湖底的等高线。大地测量要求全天候进行，中午需在现场用餐，于是就由班里的团支书把午饭送到每一个测量点上，我们则把测量工作做到中午12点才休息。休息时找个有冒水眼的树荫下（那时圆明园里有很多地下水的冒水眼），边用餐边喝清凉的地下水，一上午的疲劳一扫而光。水文测量更为有趣：我

们先在昆明湖的岸边设置几个基准点，再租用几艘小船在昆明湖面上游弋。测量人用六分仪同时观测岸上两个基准点的相对距离和高度，同时量出这时的水面深度。这样就能够求得一个个观测点的水深，也就可以利用它们画出整个水面下的水底等高线。记得我们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实测任务，可以回校做“内业”了（指水文测量的室内课程作业）。在这个下午，我们几乎畅游了整个昆明湖。

1951年，我荣幸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赵思孔和清华大学共青团委的陈望祥同志。

1951年，教育部决定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其中北京的清华、北大、燕京三校的相关系合并，清华成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燕京大学撤销；清华、北大两校要新建校舍共9.5万平方米；并抽调三校师生参加建校工作。清华校领导决定由即将在1952年毕业的土二班结构组学生脱离学习岗位，参加新建校舍的施工。于是，我、谭家骅、龚思礼负责清华第一、二、三工区的施工；汪达尊、赵思孔、徐中明负责北大第四、五、六工区的施工。其他



土二班在颐和园进行水文测量实习

结构组同学如赵禹民、谢醒悔、孙光祖等也都投入不同工区的技术管理工作。我们都兴奋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岗位和学习机遇。

1952年7月，土二班全体毕业了！每个同学都兴奋地拿到一份珍贵的由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签署的“毕业证书”。毕业后，有11位同学分配到建筑工业部，7位同学分配到重工业部，7位同学分配到水利部，2位同学分配到交通部；5位同学留校担任助教，他们是张思敬、徐一新、谷兆祺、廖松和我。

还记得1951年底，当新建校舍开工前，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设委员会的动员会上，主任委员梁思成向我们这批尚未毕业、暂留在新建校岗位上的学生宣布：“你们已经在为国家工作了。”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自豪感，会上一片欢呼声。我深情地告诫自己：“从小母亲就盼我尽快自立的愿望，即将实现了！虽然在清华大学优越的环境里学习的生活结束了，但我们将为新清华、新北大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这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国给我们新的学习和建设任务，也是清华校训要求我们学生毕业后要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第一步，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去完成和实现它！”

还记得我在拿到“清华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刻，深深感到自己在清华五年的求学生活既有丰收的感受，也有深情的怀念，更有把自己的所学真诚地奉献给祖国的期望。

我所感受的是我在清华学到了土木工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是母亲和我十几年来来的梦想；但更为重要的是学到了我的老师们的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和对学

生倾注了热爱和殷切期望的教学风格。这些学风和教学风格会指导我今后的人生。

我所怀念的是我那可爱的班集体。同学们个个热情、进步、活泼、可爱、团结，对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读的“落后分子”，给予了极为温暖的手足情意：团支部经常和我谈心，寝室里的老大哥更是细致地处处给予照料，大家还选举我为学

习干事，并负责班里的黑板报；在我还不是党员的时候，竟然提名我为“党的宣传员”，使我有了解开展社会工作的锻炼。

更使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是，学校竟把新建校舍的艰巨任务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刚毕业、没有任何阅历的学生，使我们感受到清华校领导对所培养学生的信任。我们今后要按照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要求，永远不辜负祖国交给自己身上的重担！

# 八秩清华人的点滴回忆

○ 李明源（1963届精仪）



李明源学长

我是1957年入学的。1957年是高考招生最少的一年，全国招生10万出头，其中还包括保送调干生，因此真正考试入学的也就不到10万。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许多家庭都望子成龙，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升学。由于我家弟妹众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父亲要我进工厂当徒工。我要考大学，父亲说“你实在要考大学，就给你考一次，但我希望你若考不取，就进工厂工作”。由于家中房子小，我就在工人

集体宿舍中加个床铺住宿。一天跑三次学校，晚上在中学复习功课。有两次在回家路上边走边想几何题，撞到电线杆上。当我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时兴奋极了，消息在工厂迅速传开。厂里有两位北京籍的工人不相信工人子弟能考上清华，还特意到我家看我的录取通知书。这份通知书我保留至今，有61年了。

我们二中那年考取清华的有6人。刘西拉、赵大中、周在平和我是同乘一列车去北京入学的。上清华六年仅回家一次，没有路费，在校靠每月14.5元助学金生活，家中每月寄5元就全包了。因此我还要利用暑假打工，上午到圆明园给学校放30只羊，每天5角。下午看荒岛游泳池，也是每天5角。另外还买把镰刀割草，卖100斤挣1元。这样一个暑假可挣几十元钱，为下学年所用。看看现在的学生们生活条件真是没法比。

由于国防需要，在大二时将我从机械系调入精仪系学习导航专业。临近毕业